

實證、批判、詮釋—三大方法典範之初探

劉駿州*

《中文摘要》

傳播研究融合不同領域理論、方法的十字街口特性，近年來隨著傳播理論範疇的擴張，更突顯出傳播研究在方法應用上的百家爭鳴。不過，方法或多元方法的應用，須植基於對不同方法典範的認識與瞭解。因此，本文嘗試從方法論角度，探討實證論、詮釋學、與批判理論三大方法典範之淵源、及其對於方法應用的基本觀點，並進而在方法哲學與方法實踐兩個層次，分別指出反獨斷主義的多元方法觀點，與強調研究者導向之人本觀點，希望能作為釐清傳播研究方法應用迷思的基礎。

壹、緒論

雖然所謂質化方法論（Qualitative Methodology）應用於人文學科已有超過兩千五百年的歷史（Jensen, 1991），但量化方法論（Quantitative Methodology）仍可說是當前社會科學的方法主流。在美式主流傳播研究領域，此一量化典範直到70年代批判理論引進後才受到挑戰；到80年代，隨著批判理論與方法在傳播領域中的發酵成長、與逐漸受到重視，更使量化方法受到嚴重衝擊，並促使學者反省此一量化實證方法典範獨霸的現象（Hardt, 1992）。

* 本文作者劉駿州為中正大學電傳所副教授。

自此之後，各種不同方法觀點紛紛進入傳播學界，諸如記號學（Semiotics）、意識型態分析、人類學方法、敘事體分析、文學接收分析（Hall et al., 1980; Fiske, 1980; Berger, 1982; Allen, 1987）等等以批判、詮釋方法典範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如同百花齊放，為傳播學界帶來新視野，更為主流的實證方法典範帶來極大衝激。

因此，傳播領域目前似乎正回復當年十字街口的特性，處於不同理論、方法典範交融的街口。從融合觀點，即有必要針對前述實證、批判、和詮釋三大典範的哲學背景與實踐，以及其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作一回顧整理，以研究方法為焦點，透過辨別不同方法典範對研究方法的影響，作為融合不同研究傳統的基礎。

以下即針對實證、批判、與詮釋三大方法典範的要義、與其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加以介紹討論。

貳、三大方法典範

一、實證典範

結合經驗主義的實證方法論典範，其思想淵源可上溯至Francis Bacon、Issac Newton、Thomas Hobbes等重要科學或哲學家，至於其近代的始祖則首推Auguste Comte（Polkinghorne, 1983:16-17）。Comte認為人類思想經過神學和形上學階段，目前已進入實證科學（Positivism）階段，任何知識都不再以神或其他形上因素為判準，而須經過科學實證觀察和研究來檢證，作為解釋、預測、和控制社會現象的基礎（Ritzer, 1983:12-13）。Comte的此一觀點一方面透過Durkheim的實踐，形成實證社會學傳統的萌芽，二方面又從自本世紀20年代興起之維也納學圈邏輯實證論（Logic Positivism）中，發展出深厚之科學哲學基礎。這兩項重要發展並進入影響美國社會學傳統，透過Lazarsfeld、Parsons、Merton等學者的研究和學說，使實證主義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的主流觀點。

基本上，此一主流觀點，或H. Putman所稱之「普遍接受觀點」（Received View）（Tudor, 1982:49），可從實證主義本身基本立場、觀念、和實踐三個面向，來解釋其基本意含，及其對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在基本立場方面，實證論以經驗主義為基礎，排斥一切形上學，認為知識必須以人曾經驗到和可經驗的事物為基礎（Carnap, 1956; Popper, 1968），而對於與經驗相對應之外在世界，實證論採取唯實論（Realism）立場（Schlick, 1932/1991; Hammersley, 1992），視

外在世界事物為客觀存在，因此人所經驗到的事物應具有客觀共同性。基於上述唯實論基本立場，社會科學研究即可在此客觀共同性基礎上將人類經驗量化，視每個人對某一事物的經驗為客觀等值，並加以累計分析，形成所謂經驗量化的研究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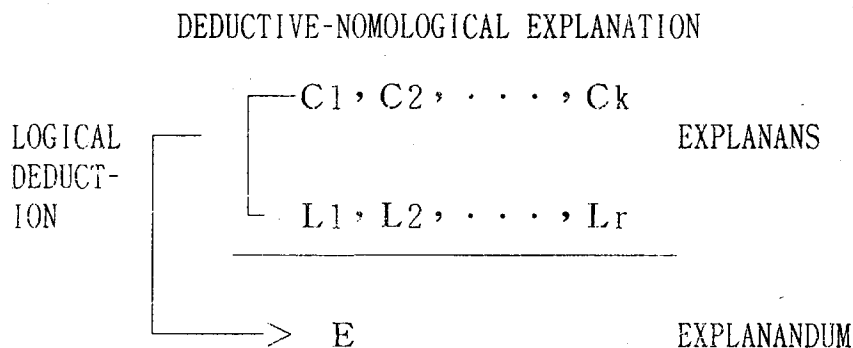
但從前述經驗的客觀共同性到客觀知識的產生，實證主義對此過程，在觀念層次，具有以下三個重要觀點（Von Wright, 1971）：

1. 獨尊科學方法：只有科學的方法或判準能產生客觀知識。
2. 效法自然科學：視人類行為、社會現象同於自然現象，因此研究人類行為、社會的學科應效法嚴謹的自然科學觀念與方法，也就是視社會科學同於、甚至屬於自然科學的一元論觀點。
3. 強調因果關係：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是作為解釋社會現象，並進而加以預測、與控制的基礎。

這些觀點的一項中心觀念，即希望找出放諸四海皆準的一致性通則、或客觀知識，因此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即必須比照自然科學，強調研究的實驗設計、以及信效度的考驗等，以確保研究結果具有可推廣之普遍性，成為客觀知識。

以上述觀念為基礎，實證論落實在研究的實踐層次，可有以下三個特性：

1. 歸納驗證法則：實證論依據驗證法則（Verification），強調研究結果或解釋的可驗證性。一個語句必須是可驗證的，並且能通過利用歸納原則測試其在各種條件下是否為真的考驗，才能被視為真（Carnap, 1956; Hempel, 1965）。
2. D-N解釋模式：C.G. Hempel以普遍法則（COVERING LAW）作為解釋基礎的觀點。Hempel認為科學解釋需符合可檢驗性標準，並依循邏輯演繹規則，因此從通則（GENERAL LAW, L）與條件事實（C）再加以演繹，即可推演出對現象的解釋（E），如下圖（Hempel, 1965:249）：



當然，通則或法則本身性質會對解釋的本質產生影響；如根據基於統計顯著考

驗產生的統計法則（Statistics Law）推演的解釋，即帶有機率的性質；而Hempel此一視解釋本質為演繹過程、基於法則運作的觀點，也隱含無論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皆應遵循上述規則，才能被接受為科學解釋的看法。

3. 假設演繹：基於上述驗證原則與通則配合條件事實演繹兩項特性，實證研究同時傾向採取假設演繹（Hypothetico-Deductive）的研究架構模式（Hempel, 1966），透過假設的推演和驗證，不僅有助於建立科學法則，更可幫助解釋與理論的發展，使社會科學研究建立假設→研究→解釋→理論→假設的循環過程。

以上概述實證主義、尤其是邏輯實證論學說的基本立場、觀念、與實踐，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這些影響整體而言即被視為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量化（Quantitative）取向傳統。而此一量化取向無論是在傳播學界、或整體社會科學領域，都曾遭受來自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主之批判理論的猛烈炮火，以下即介紹批判理論觀點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

二、批判典範

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中心發展之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繼承馬克思主義思想，並結合許多不同領域學說，如當代哲學、心理分析、語言學等，形成豐富的體系，自二〇年代起就受到許多學者重視，至今成為重要社會理論，並且在所謂新馬克思主義或新左派陣營中，也居於領導地位。

批判理論思想淵源來自許多不同方向，固然主要是承襲Marx的傳統，包含黑格爾辯證法、歷史哲學，德國觀念論對人的概念等哲學層面的思考，以及Marx本身對勞動、資本主義、上下層結構之學說與批評；但同時也廣泛吸取其它學者如Weber對理性化和科層化的看法、Dilthey的總體性觀點和相對、二元主義、Freud的心理分析、Lukacs的異化概念、Althusser的意識型態分析等學說，對批判理論的產生很大影響（Held, 1980; 高宣揚，1984; Merquior, 1986）。

批判理論對社會學科方法的影響，主要在其對實證論的反對。不過首先須說明的是，批判理論對方法的態度，為否定一切理論或方法體系化的重要性。批判理論認為體系的建構即暗指同一絕對真理的存在，否定其它相對存在真理的可能性，且體系化目的原為追求真理，而非排除其它意見，但體系化卻往往將排除異己的手段視為目的，以造成體系的獨尊，但如此卻形成一種化手段為目的之異化現象；如此一來，體系不但不能彰顯真理，本身反而成為妨礙真理探討之主因（Adorno et al., 1976）。

這種否定體系的態度也表現在批判理論的方法哲學層次。Adorno 提出之「否定辯證法」(Negative Dialectic)即指出從黑格爾以降學者討論的辯證法，都注重從正反合過程中建立體系性的思想，其辯證最後會達到一種肯定，或歷史的必然狀態而結束，Adorno將這種辯證法稱為「肯定的」或「封閉的」辯證法，而否定辯證法就是要反對這種辯證發展過程的必然性觀點，採取無歷史必然終點、不斷否定的批判態度，以避免導致理性的異化，並以自由反省的理性來思考個人、社會本身處境，認清時代脈絡中相對的真理，作為批判社會的基礎(Adorno, 1973)。

至於批評理論的真理觀，與實證論有實存客觀真理的觀點相異，批判理論指出真理受特定歷史條件限制，相對隨歷史發展，但真理的相對性不能被主觀地絕對化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真理由當時、當地的實踐所確定，不能因不同人主觀意念而改變。批判理論反對形上學的絕對真理，強調真理應和實踐結合，而因人類的實踐也在歷史脈絡中進行，且為一客觀事實，所以基於實踐獲得的真理即具有客觀性質(高宣揚，1984:145-149)。

基於上述方法體系與真理觀的理論基礎，批判理論對研究方法的觀念，可從Bottomore(1984)指出之批判理論對實證論的三項主要批判中窺出：

1. 實證論只注意孤立事實，無法獲得綜觀能力以掌握社會全貌，因此應從整體性觀點來考察社會現象。
2. 實證論只注意目前實際存在的客觀事物，基本上就站在承認其存在合法性的預設上來研究分析，所以它會傾向維護現有社會秩序，反對任何會使其預設或基礎動搖的激烈變化。
3. 實證論與導致「技術官僚宰制」的科學主義密切相關，透過異化之「科學至上」工具理性，研究者顛倒追求真理與科學方法間的目的、手段區別，一味僵化使用科學方法，反而視方法為目的，造成研究者與整體學科異化於工具理性而不自覺。

整體而言，這些觀念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與批判理論對社會的批判態度一致。根據阿多諾「否定辯證法」，社會中一切因素都可被批判，而對這一切因素整體的總批判即可稱之為文化批判，否定辯證法就為文化批判的批判工具，透過不斷否定，期望使社會不斷地朝理想情況發展，而社會研究在觀念層次就應與此批判觀念結合，負有改善社會的責任與目的。

此一研究觀念的落實，最重要的就是對外在政治經濟和內在意識型態的批判分析。一方面對外在整體的社會環境與集體意識加以批判分析，暴露出社會中不自覺的

不合理現象，另方面不斷反省本身的意識與外界環境的限制，希望改善人類理性隨著資本社會發展，受資本階級和生活滿足的影響而只被用來為資本利益效命，異化為追求利益工具性理性的現象，使人們從只知理性能追求利益、改善物質生活、忘了理性最重要之反省和批判能力現象中解放出來，作為社會不合理現象之批判反省的基礎。

批判理論與前述實證論，恰可視為影響社會研究方法的兩個不同極端，而立場在兩者之中的，或許就是詮釋典範。

三、詮釋典範

古代詮釋學起源於自古希臘對神喻的詮釋，其字根Homes即為負責傳遞宙斯神意的神祇，詮釋學（Hermeneutics）字義上也有解說（To Say）、解釋（To Explan）、和傳譯（To Translate）三層含義（Palmer, 1969:13），歷經中世紀的解經傳統，近代詮釋學則受Schleiermacher和Dilthey兩人影響最大，前者將詮釋劃分為共同語文結構基礎下的「文法詮釋」，以及作者個人創作風格的「技術詮釋」兩個層次，後者則為詮釋學奠定人文學科基礎，強調對人類社會行為的研究異於自然科學要求因果關係的解釋，而應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詮釋，而此理解即為詮釋學與自然科學區分的首要方法基礎（沈清松，1985:299-302）。通過Dilthey 詮釋學也受到現象學相當大的影響，尤其是Husserl「回到事物本身」的理性觀點，直接影響了詮釋學理性與真理開展的觀點（Bell, 1990）。

詮釋學對真理的看法接近前述批判理論觀點，認為真理存在於人類生活、行為、社會、及歷史脈絡中，詮釋學的目的就在於從此脈絡中彰顯真理，但對此彰顯真理方法則因詮釋學中派別不同，而看法各異，對社會研究觀念與方法也各有啟示。基本上，從此詮釋學三大派別的劃分中（Bleicher, 1980；沈清松，1988），可釐清其對方法的不同觀點：

1. 哲學詮釋學：此一主要派別著重詮釋學在本體論和知識論上的探討，Heidegger首將理解從方法提昇至存有層次，理解不僅是詮釋的方法，更是人存在的基礎，Gadamer繼承此一本體論基礎，強調理解更須基於由以往人類生活、歷史脈絡總集合之「傳統」來進行詮釋，以現代與傳統的「視域」彼此融合後，方能以不受污染的理性，開顯社會現象中的真理（Gadamer, 1975）。不過對方法層次言，Gadamer強調真理透過理性理解、詮釋過程，在社會脈絡中的開顯，相對不重視接近、確保真理的方法，可說是採重真理而輕方法的態度，不應用任何可能限制理性理解、詮釋方法程序或結構。

2. 方法詮釋學：與哲學詮釋學相異，方法詮釋學仍注重方法在詮釋過程中的地位。美國文學批評家Hirsch強調對文本作者意義的理解，而此理解的詮釋，在方法上乃透過錯誤猜測的批判與測試過程而呈現（Hirsch, 1967:25）。P. Ricoeur更擴大詮釋學方法的應用領域，指出對方法的重視可增進詮釋學的嚴謹性，並強調以文本作為詮釋對象，包含從語文、行動到每日生活的詮釋（Ricoeur, 1991）。在實踐層次，Ricoeur將對文本和其內外整體結構的解釋（Explanaton）與理解（Understanding）視為一連續循環過程，而此一過程即構成詮釋之方法（Ricoeur, 1976）。
3. 批判詮釋學：簡而言之，批判詮釋學的特性，即在其結合詮釋與批判兩個領域之觀點及其方法。此一取向主要學者包括Apel及批判理論大師Habermas，強調詮釋學除第一階段基於前述方法的詮釋外，更重要的是第二階段的批判。而此一批判著重的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希望彰顯詮釋者本身與詮釋對象間的潛在意識型態，使歷史、社會脈絡中的意義或不合理現象更加清晰，從而改善此不合理的現象（Bleicher, 1980）。

當然，上述三種取向並非絕對互斥，不可加以綜合。事實上，從方法論觀點，三派詮釋學可基於Gadamer詮釋開顯真理的本體、知識論基礎，從而建立解釋、理解、批判三步驟的詮釋方法（沈清松，1988:27），針對事物意義加以彰顯詮釋；而此一方法觀點並影響社會科學研究對社會現象、或研究對象之社會脈絡、情境、傳統的重視，以及強調現象的意義探討、而非因果關係的預測操控。

叁、批判與討論

實證、批判、與詮釋三大典範的哲學觀點、基礎各異，彼此也時有論戰，尤以批判典範對實證論的炮火最為猛烈；整體而言，三大典範觀點、取向的差異可依Habermas的觀點歸納為下表（Habermas, 1971; 黃瑞祺，1986）：

表3-1 三大典範差異表

知識形式	資訊	解釋	批判
方法論架構	律則性假設的檢證	作品的解釋	自我反省
學科類別	經驗性—分析性的學科	歷史性—詮釋性的學科	批判取向的學科
認知興趣	技術的興趣	實踐的興趣	解放的興趣
取向(關注)	技術性的控制	互為主體的了解	解放、自主、負責
行動類別	工具性的行動	溝通行動	被有系統地扭曲的溝通
生活要素	勞動	語言(互動)	權力(支配)

Habermas基於批判理論對認知興趣、行動、日常生活等面向的重視，將三種典範劃分為技術／工具理性、實踐／語文詮釋、及解放／意識型態溝通等不同取向，強調批判典範企圖透過被扭曲溝通現象，彰顯並解放不合理潛在意識型態所造成之權力支配，而解放的目標，則正是受實證主義影響之傳統工具、技術理性社會。

批判理論對實證論的三項主要批評已詳如前章所述，值得補充的一點是Habermas從知識與方法的角度，指出就實證論觀點知識乃伴隨科學方法或判準而存在，也就是科學決定知識、或客觀知識、科學方法先於知識。但就批判或詮釋觀點，可能的知識卻是成就科學或科學方法的原因。Habermas認為實證主義的看法造成知識的科學獨斷論，不僅排除其它可能的知識，也阻礙了其它開顯真理的方法，因此也是一種方法的獨斷論，Habermas即以此批判實證論的科學主義與獨斷傾向（Habermas, 1971; 1988; Holub, 1991）。

另外，針對三種典範的比較，Burrell和Morgan（1979, ch.3）以追求主／客觀、與強調社會規律／變化為兩軸，區分三種典範，其中詮釋與批判均屬追求主觀面向，唯詮釋強調基於社會的規律性，批判則強調影響社會變化。實證主義在此分類中屬追求客觀面向，並依規律／變化兩端分為結構功能論與衝突理論兩個取向；這一分類方式清楚指出批判與詮釋典範差異，更可釐清三個典範間關係。

至於在方法實踐層次，若將詮釋與批判典範視為與實證論量化（Quantitative）取向相對之質化（Qualitative）取向，參考不同學者觀點（Bryman, 1988; Hammersley, 1992; Potton, 1990; Thompson, 1989），兩者研究方法觀念可有以下十五項差異（劉駿州，1992:97-98）：

表3-2 質量方法基本差異表

	質 QUALITATIVE	量 QUANTITATIVE
哲學基礎	解釋哲學 INTERPRETIVE PHILOSOPHY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傳統領域	人文學科 HUMANITIES	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研究目的	理解世界 UNDERSTANDING	建立通則 GENERALIZATION
研究觀點	整體綜觀 HOLISTIC INSIGHT	線性因果 CAUSE & EFFECT
研究基礎	解析意義 MEANING CONTEXT	經驗量化 EMPIRICISM
研究環境	自然情境 NATURAL SRTTING	設計操弄 ARTIFICIAL DESIGN
研究策略	歸納分析 INDUCTIVE ANALYSIS	假設演繹 HYPOTHEESE DEDUCTIVE
研究程序	自我反省 SELF-REFLEXIVITY	固定結構 STRUCTURED
研究身份	深入浸淫 INSIDER	置身局外 OUTSIDER
資料特性	豐富深入 DEEP & RICH	量化可信 ACCOUNTABLE
結果分析	透視詮釋 INTERPRETATION	科學驗證 VERIFICATION
結果呈現	語文敘事 NARRATIVE	統計量表 STATISTICS
結果評估	相互主觀 INTERSUBJECTIVITY	追求客觀 OBJECTIVITY
理論發展	浮現理論 EMERGENT	印證理論 CONFIRMATION
主要方法或技術	參與觀察法 自然觀察法 歷史分析 圖書文獻分析法	調查訪問法 實驗分析法 統計法

這十五項差異指出質量方法的哲學基礎、研究觀、與資料結果分析等面向對方法實踐的影響，不過批判與詮釋典範方法雖可通稱質化研究，但批判與詮釋典範除前述規律／變化傾向的區別外，在方法層次更有多項爭議。

此一爭議主要源自Habermas對Gadamer的批判。兩位學者的爭議焦點，主要在於對彼此典範方法普遍有效性（Universality）的質疑（Ricoeur, 1991:270-307; Silverman, 1991:151-180）。Habermas質疑詮釋學根據傳統／現代視域融合形成之理性詮釋是否具有普遍性，或是否真能開顯真理，而強調應以自我批判探討意識型態或潛意識來彌補此一危險；Gadamer則懷疑此意識型態自我批判的可能性，認為批判理論與傳統或偏見對立的立場，忽略可從此傳統或偏見中發展詮釋的積極意義，反而令人質疑其自我批判在排除傳統與偏見的基礎上是否可能。

因此，從此批判與詮釋典範方法應用觀點的差異，兩者在上表中的研究目的，就有單純理解世界，與進一步改善世界的差別，彰顯出兩種典範作為方法的基本差異。

肆、結論

綜合上述三種典範間的討論與批判，各種方法典範雖基於其不同哲學背景，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產生不同影響，但對傳播研究言，研究者若能掌握前述這三種典範的不同背景、觀念、與方法應用準則，則無論是從方法論落實到方法，或從研究結果回歸到理論，都不至產生誤用或誤解，且研究者對此三種典範的掌握，更可作為不同典範研究間交流的基礎。

但即使是在研究者能通盤掌握不同方法典範觀點的基礎上，典範間的交流仍面臨一兩難困境。在研究者面向，由於如前述，三種方法典範的確存在一些哲學前題、或世界觀上迥然相異，甚或針鋒相對的觀點，因此對於傳播、甚或整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研究者而言，仍無可避免地將面臨確定本身之方法典範立場、甚或是建立「信仰」之根本選擇問題。然而研究者若選擇某一典範立場，並堅持其哲學背景立場而黨同伐異，則不同典範間即無對話的可能，對典範、理論、方法的發展毫無助益。

但若研究者尋求典範間之對話與交流，則在方法典範面向，不同典範間的交流與結合是否會產生如同典範轉移之「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Kuhn, 1962; Feyerabend, 1975/1988）現象之問題，直接質疑基於不同方法典範之研究能否累積、比較的可能性，而使典範間的交流在研究者與方法典範兩個面向間陷入一兩難局面。

面對此一難題，似可從方法哲學和方法實踐兩個層次，來加以討論：

1. 方法哲學層次：Feyerabend提出之「Anything Goes」方法哲學觀點（1975/1988），可作為不同典範相互包容、並進一步相互交流的基礎。不同典範之研究應採取此一多元的方法觀點，而非獨尊一套方法的權威或獨斷主義，並承認不同典範研究之價值，使各種典範方法在一視同仁的基礎上尋找交集。
2. 方法實踐層次：在此實踐層次，即以研究者為重心。研究者可採取一「人本」觀點，做為調合不同典範方法的基礎。此一「人本」觀點基本上即希望強調方法乃為人所用，人應有針對問題選擇方法的自主理性，而非為要用某種方法而用，異化為方法或典範的奴隸。

透過上述方法的多元觀點與實踐，即可望解放典範、方法間的對話，而研究者也應明辨不同典範對方法的影響，對方法運用採取兼容並蓄態度，並且時時自我批判，著重方法本身的反省研究（Steier, 1991），並以此為基礎將視野擴大，不汲汲於追求確定性之方法、理論、或典範，而從綜觀貫時之歷史、比較的研究觀點，探討方法、理論、與典範間的互動（Gurnah & Scott, 1992）。尤其對目前正回復十字街頭特性的傳播研究領域，更應以前述「開放多元」與「人本」的態度掌握住此一方法十字街頭的脈動，而非走入獨尊一套方法的單行道。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 沈清松（1985）：《現代哲學論衡》，台北：黎明文化。
- 沈清松（1988）：〈解釋、理解、批判：詮釋學方法的原理及其應用〉，在台大哲學系主編，《當代西方哲學與方法論》，頁19-42，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高宣揚（1984）：《批判理論導引》，香港：三聯書店。
- 黃瑞祺（1986）：《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增訂版，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劉駿州（1992）：〈「辨」而不「辯」：質量方法異同與綜合之初探〉，《新聞學研究》，第四十六期，頁95-109。

英文部份

- Adorno, T. W. (1973). Negative Dialectics. N.Y.: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 Adorno, T. W. et al. (1976).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 Allen, Robert C. (ed.). (1987). Channel of Discourse. London: Methuen.
- Bechtel, W. (1988).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 Overview for Cognitive Science. Hillsdale, N.J.: LEA.
- Bleicher, J. (1980).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as Method, Philosophy and Critique. London: RKP.
- Bottomore, T. (1984).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Tavistock.
- Bryman, Alan (1988).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Unwin Hyman.
- Boyd, R. et al. (eds.). (1992).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urrell, G. and Morgan, G. (1979). Sociological Paradigms and Organisational Analysis. London: Heinemann.
- Carnap, R. (1956). Meaning and Necessity. Enlarge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yerabend, P. (1988). Against Metho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 Fiske, J. (1982).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Methuen.
- Gadamer, Hans-Georg (1975). Truth and Method. Second Revised Edition. Crossroad Publications.
- Gurnah, A. and Scott A. (1992). The Uncertain Science: Criticism of Sociological Formalism. London: Routledge.
-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Boston: Bacon Press.
- . (1988).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Polity.
- Hall, S. et al.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 Hammersley, M.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 Hardt, H.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 Theory 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Held, D. (1980).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Hutchinson.
- Hempel, C. G. (1965).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 (1966).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Englewood Cliff, N.J.: Prentice-Hall.

- Hirsch, Jr., E. D. (1967).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lub, R. C. (1991). Jurgen Habermas. London: Routledge.
- Jensen, K. B. (1991). Humanistic Scholarship as Qualitative Science: Contribu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K. B. Jensen and N. Jankowski,(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pp.17-43.
-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Seco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rquior, J. G. (1986). Western Marxism. London: Paladin.
- Palmer, R. E. (1969). Hermeneutic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 Polkinghorne D. (1983). Methodology for the Human Science. Albany, N.Y.: SUNY Press.
- Popper, K. R. (1968).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Harper & Row.
- . (1983). 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Ricoeur, P. (1976). Interpretation Theory. Fort Worth: The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 Ricoeur, P. (1991). From Text To Action: Essays in Hermeneutics, II.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Ritzer, G. (1983). Sociological Theory. N.Y.: Alfred A. Knopf.
- Schlick, M. (1932/1991). Positivism and Realism. in R. Boyd et al. (eds.), pp.37-56.
- Silverman, H. J. (1991). Gadamer and Hermeneutics. London: Routledge.
- Steier Frederick (1991).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Thompson, Bruce (1989). The Pla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The Importance of Post-Paradigmatic Thought. in Bruce Thompson (ed.),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Research Annual. Volume I. Conn.: Jai Press. 1989, pp.43-70.
- Tudor, A. (1982). Beyond Empiric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Sociology. London: RKP.

Wright, G. H. von, (1971).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 Review of Three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Positivism, Critical Theory, and Hermeneutics

Chun-chon Liu

ABSTRACT

The infusion of theories from diverse fields has brought about the ferment of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se years. Trying to clarify the methodological roots of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methods,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basic idea of three main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 positivism, critical theory, and hermeneutics -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at have deeply influenced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y emphasizing the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and the "researcher-oriented approach"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is article also hope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to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ractice.

